



把扩大内需落到实处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学者解读《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下)

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内需发展动力

□ 陈江滢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提出“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内需发展动力”。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实行更高水平开放,能够为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拓展扩大最终需求提供强大动力。

深层次改革,为扩大内需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改革增进市场活力,推动企业投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通过紧紧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实现产权有效激励、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机制,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企业投资信心。另一方面,改革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居民消费。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推动人民生活实现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大幅提高居民收入,为居民“能消费”夯实基础。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入,推进民生领域重大改革和制度建设,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改革,为居民“敢消费”提供保障。

高水平开放,为扩大内需注入新的活力。一是促进消费投资,扩大内需规模。进口大幅增加有利于满足我国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从而促进消费;外商投资迅速增长,成为推动我国投资增长

的重要力量。二是利用国际高端要素资源,提升内需发展效率。通过先进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高技术产业的外商投资,以及在高科技领域的海外并购,引入技术、资金、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有利于弥补产业链供应链和生产投资短板。三是提升供给质量,满足国内需求。进口结构优化,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利用外资增长,不仅直接增加了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供给,还通过竞争效应促使国内企业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消费需求的适配性,满足我国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四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释放内需潜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从东部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向沿海、沿边、内陆的协同开放,能够推动中西部和沿边地区发展,释放这些地区的内需潜能。

深化改革需要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为高水平开放奠定基础;制度型开放要求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倒逼深层次改革。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为内需发展增添强大动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

第一,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在消费类型方面,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的重点领域,而该领域准入限制较多,制约了服务消费的增长。应根据行业特点放宽或取消服务消费领域的准入限制,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随着消费

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消费欺诈、劣质产品、价格不合理、消费者维权渠道有限等消费者权益受损问题层出不穷,打击了居民消费信心。对此,需要健全新型监管机制,建立假冒伪劣产品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强化重点商品和服务领域价格监管,完善多元化消费维权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

第二,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当前,投资主体转型升级的能力不足和方向不明确、投资审批耗时长和效率低、融资难融资贵等投资困境仍然突出,进一步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由之路。首先,加大对民间投资支持和引导力度。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两新一重”和补短板领域建设,鼓励民营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推动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其次,完善投资管理模式。推进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投资审批数据部门间共享机制。最后,健全金融机制。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

第三,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土壤,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举措,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必然要求。首先,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完善生产许可制度,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其次,健全现

代产权制度。加强产权保护和激励,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加强数据、知识、环境等领域产权制度建设。最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公共信用信息同金融信息共享整合机制、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消费信用体系等信用机制建设,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

第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首先,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扩大重要商品和服务进口,支持优质商品、关键技术、重要设备及零部件、研发设计、节能环保等商品和服务进口。持续提升利用外资水平,支持外资企业扩大中高端制造、高新技术、传统制造转型升级投资、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其次,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打造高水平、宽尺度、深层次的开放高地,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再次,优化对外开放布局。在国际层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场。在国内层面,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协作互动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示范效应,加快培育更多内陆开放高地,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

以共同富裕厚植内需发展潜力

□ 王 钺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厚植内需发展潜力”。这反映出实现共同富裕与扩大内需、发展经济的紧密联系。因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内需发展后劲,而且还能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

共同富裕能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一方面,当居民“口袋里有钱”时,才会有信心去消费。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逐渐扩大,从而能够有效提高全社会的购买力水平,提升居民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因此相较于提升金字塔顶端人群的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更能够激发居民的消费倾向,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可以促进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提高,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居民消费潜力。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增加,会带动整个社会投资需求的提升,在正向“棘轮效应”的作用下,又会不断提升全社会的消费水平。

共同富裕能够创造更高质量的需求。在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断扩大、低收入群体收入持续增加,社会实现公平正义,逐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居民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会

不断增加,而高质量的需求又会引致高质量的供给,从而倒逼供给端的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水平,力图为消费者提供出更高质量、更富体验效能与使用功效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供给的质量和多样性,提升我国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韧性。高质量的供给又能引领创造出新的需求,从而推动形成供给结构优化与总需求适度扩大的良性循环,不断提高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共同富裕能够提升消费和支出的科学性。在共同富裕目标的指引下,政府公共支出会向推动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发展更具优势更具均衡的教育、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倾斜,使得居民在不断提升收入水平的同时降低了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规模的调整。与此同时,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支出的增加,会不断强化政府消费和支出的成本意识与责任意识,促使政府进行更加科学有效的投资和消费。

可以看到,共同富裕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动力源泉,因此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结合起来。

第一,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覆盖面最广泛,与群众利益相关性最大。我国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来自于劳动所得,因而提升劳

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既能调动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又保证了分配的公平,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首先,各生产单位要与员工建立起“事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分配方式,与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其中既包括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也包括完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其次,公有制部门牢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非公有制部门需进一步提升按劳分配比重,积极健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机制。通过提高劳动收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和高质量消费能力。

第二,继续加大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二次分配是进一步确保分配公平的重要方式,包括税收、社会保障的五险一金以及转移支付三个方面。首先,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与财税公平原则的契合程度还不高,高收入阶层的纳税牺牲程度往往低于工薪阶层,主要原因在于个人所得税主要对劳动要素征税,忽视了资本所得的影响,因而要进一步加大对资本收入的征税力度。其次,受房产溢价的影响,房地产成为个人或者家庭财富积累的主要形式,因此,需要创新房地产税体系,建立健全耕地占用税、房地产税、契税和印花税在内的房地产税体系,发挥房地产税对财富的调节作用。通过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提高全社会

平均消费倾向。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首先,扩大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提高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在总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将增加的社会保障支出更多地用于低收入群体、欠发达地区。其次,推动社会保障在城乡间的均衡发展。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资源和社会保障标准存在明显的城乡失衡,因此需要提升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和补助标准,建立起城乡一体、互为协调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社会消费结构和消费规模。

第四,充分发挥三次分配的调节作用。当前,中国民间财富积累日益增加,但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却较为滞后,充分发挥三次分配对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体的收入调节作用。首先,建立健全慈善事业发展体制机制,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倡导、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优秀传统文化,激发更多的优秀企业家和高收入群体参与慈善事业。其次,建立以社区为单位的“大众慈善”捐赠平台和活动,夯实中国慈善事业的社会基础。最后,完善慈善褒奖制度,对参与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的高收入群体和组织给予一定的奖励或优惠,激发这些高收入群体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的动力。通过在更大范围内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厚植内需发展潜力。

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

四是提升应急管理能力。一些重大安全事件突然发生,会造成需求激增,物资挤兑,供给不足,供需严重失衡的极端情况,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转造成巨大冲击。这就要不断提高应对突发应急事件能力。加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强化公共卫生、灾害事故等领域应急物资保障,完善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应急物资储备网络,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区域布局。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强化应急管理装备技术支撑,完善配套应急处置设施,推动救援队伍能力现代化。推进灾害事故防控能力建设,加快构建灾害事故监测预警体系、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应急通信体系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发展巨灾保险。切实提高应急管理能力,确保在极端条件下能够保障内需,使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大的影响,为国内市场平稳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产需有机衔接

□ 崔琳

完善的市场体系可以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高效的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把生产和消费有机联系起来。《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将“健全现代市场和流通体系,促进产需有机衔接”作为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点任务。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制约产需衔接的制度梗阻。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拥有包含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和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国民经济的产需两端都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此基础上,能否有效开发市场需求、持续改善供给质量,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关系到国民经济循环的健康与畅通。当前,国民经济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仍存在堵点、断点,制约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性阻碍依然存在,垄断经营、准入限制、地方保护与行政壁垒等妨碍公平竞争的因素尚未消除。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一招就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理顺地方竞争关系、明晰政府与市场边界,构筑起支撑市场高效运转的制度地基,以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的要素商品和服务市场、统一的市场监管标准与高水平

的现代物流体系,破除封闭小市场、地方小循环,打通制约供给质量提升与需求优化升级的制度梗阻,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持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要求,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夯实内需发展基础。实现发展安全必然要求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而不断释放内需潜力,稳定内需,保障内需,则要求把安全发展贯穿扩大内需工作各领域和全过程。这样才能夯实内需基础,确保我国经济行稳致远,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扩大内需是发展安全的必然选择。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环境条件深刻变化。从国内环境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消费结构多样化、个性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中等收入人口约有4亿,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拉动力,内需空间十分广阔,国内市场基础更加扎实。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把安全发展贯穿扩大内需工作各领域和全过程

□ 王 松

进,世纪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平衡不确定性增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条件日趋复杂严峻,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自身的稳定发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这就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更好依托国内大市场,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内需拉动作用,建设更加强大的国内市场,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保证国内市场需求稳定,居民基本需求、重要资源和关键领域要具备切实可靠的安全保障,夯实内需发展安全的战略之基。

一是要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粮食安全乃“国之大者”。我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小,粮食需求总量大,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进粮食稳产增产,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健全粮食产购储加销体系,持续倡导节粮减损,加强种子安全保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二是确保能源资源安全。能源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能源体系高度依赖煤炭等化石能源,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0%以上,油

气勘探开发、新能源技术发展不足。生产和生活体系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压力大,实现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任务极其艰巨。要强化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增强国内生产供应能力,完善产供储销体系,确保能源、重要资源供给安全。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依赖,全面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三是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我国是制造大国,具备完备的产业体系,但我国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随着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内顾倾向

明显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经济循环。这就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拉长短板,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推进制造业补链强链,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用科技创新保持产业链供应链运行,用加快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保证安全形式。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保障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安全稳定运行,